

通货膨胀的实质和物价水平的测算

邱 泰 如

一、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关系

对于通货膨胀问题，近年来学术界论著颇丰，但对各类型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内在联系，却有待进一步探讨。

通货膨胀是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额超过商品流通的货币必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的全面持续上升。早期货币数量论者费雪认为，货币供应是价格水平的唯一决定因素。此说失之偏颇。譬如，商品和劳务质量的提高，以及商品本身价值增加，固然也会引起物价水平上涨，但这并非通货膨胀的现象。另外，弗里德曼曾断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学派观点的根据是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价格弹性为1）、新正统学派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供应学派理论，而未能洞悉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我认为，引起货币过量发行和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是复杂的。这些深层原因，或者会酿成全局性的过多通货量，或者会引起局部的过多通货量。并且，不是象货币学派所说的那样，一概先由货币发放量过多而后引起物价上涨（以下简称超前于物价上涨的过多货币发放额）。事实上也可先由成本提高、经济结构失衡、体制不完善以及决策失误等原因，而后迫使银行追加过多的货币发放额（以下简称滞后于物价上涨的过多货币增发额）。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各类型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关系：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指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所产生的“通货膨胀缺口”、“商品缺口”。社会总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它等于社会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流速速度的乘积。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自然会引引起总需求的膨胀。

再分析一下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引起后续加工产品价格上升，并导致生产总量减少（这点常为学术界所忽略），从而引起物价水平上升。这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其中，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实际工资随着货币工资增加而增多，以及劳动生产率于短期内又无法提高的情况下，企业会缩减雇佣人员和产量，产出减少的结果是消费下降。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所以消费下降的幅度小于生产下降的幅度。于是出现过量的需求，致使价格上升。根据成本各构成部分在刺激物价上昂过程中的作用，成本推动论模型可分为两类：一是着重利润率附加作用的，一般称为利润率附加模型；二是偏重工资的，一般名之曰工资领导模型。

在较全面地把握上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内涵的基础上，还要弄清这种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关系。第一，货币流通逾额，引起总需求膨胀，它拉上“上游”产品价格，进而推动“中下游”产品成本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出现后，产生生产资料涨价的预期效应，往往又会诱发抢购和囤积物资的动机，促使企业向银行告贷。第二，生产成本猛增，企业的现有资产存量使简单再生产规模难以为继，或使利润率下降，遂引起减产或停产，减少有效供给。这样，即便货币发行量不变，也会引起供不应求。如果要维持简单再生产而无其他资金

来源,企业就会向银行称贷。第三,由于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攀比效应,容易引起工资—成本—价格之间的轮番推进,增加企业成本费用,并要求银行发放贷款。在企业 and 各级政府自下而上要求增加贷款的压力面前,由于专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健全以及中央银行缺乏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就屡屡被迫迁就地松动银根,或误认为货币量不足而追加贷款和增发货币,从而形成滞后于物价上涨的货币增发额。

最后讲一下需求移动型通货膨胀(它比结构型通货膨胀的概念显得较为生疏)。这是指在社会总需求既定时,由于资源不能随需求结构的变化而流动,引起价格水平上扬。具体地说,随着需求快速地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转移,需求增加的部门和地区,由于资源短缺和工资刚性,其物价和工资会上升。与此同时,需求减少的部门和地区,在存在垄断价格和工资刚性的情况下,其物价和工资却未下降,或其降低的部分不能抵销那些需求增加的部门和地区的物价和工资上升的部分,故而引致物价总水平上升。这几年我国出现需求移动型或结构型通货膨胀,其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资源流动又受阻滞,生产力结构调整难以奏效,适应不了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需求移动型或结构型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息息相关。首先,需求增加的部门和地区的物价上升和工资增加的总额,大于需求减少的部门和地区的物价下跌和工资减少的总额。因此,从全社会来看,会引起物价总额和工资总额的增加。在此情况下,倘银行被迫追加贷款和增发货币,就会出现滞后于物价上涨的过多货币增发额。其次,随着“货币幻觉”的破灭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应于滞销商品的那一部分货币,不但会用于购买紧俏商品,而且也会移向一些供求原属基本持平的商品(这在商品抢购风潮中并非鲜见),以求货币保值或部分保值。由于一部分长线产品最终无人问津,即令社会总供求在总量上平衡,也会使用来购买短线或基本平衡的商品货币显得过多,致使这些商品容易涨价。再次,在长线产品严重积压而产业结构调整又未遂愿的情况下,如果以基期为基数,按经济增长率和计划物价上涨率(而非可承受的物价上涨率)作为计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依据,在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中就含有滞销长线产品价格这一因素。这样,在构成上,对应于非长线商品的货币会显得过多(尽管假设社会总供求在总量上是平衡的)。

在探究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关系时,还应正确看待货币供应量影响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的时限问题。国外学者用大样本或时间序列方法对统计资料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趋势看,货币供应量增长最终要反映在物价总水平上。但在短期内,因为存在货币政策效应的时滞,以及货币变动的传送和过程的不同,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的相关程度会降低。而不象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会直接迅速地反映在物价上。譬如,通过对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经济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回归分析表明,就长期趋势而言,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普遍地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可是,在这一时期的个别阶段,有的国家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而易见。

二、物价水平的测算

科学地测算物价水平,既是反映通货膨胀所需,也是宏观经济管理指标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指标。物价总水平变动幅度可先分项测算,然后加总。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因素有计划调价、自发变价和上年翘尾,它们可分别被测算。计算国家计划调价的变动,可采用权数

法、金额法、投入产出法和系数法。其中，权数法系指一项主要商品调价引起的许多相关商品价格的变动，金额法是计算商品调价总额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自发变价的变动可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来测算。至于上年的翘尾值，则等于上年12月份物价指数变动幅度与上年平均新变价幅度的比率，它会促使本年物价总水平上升。此外，测算一般物价水平的还有多种方法。其中，有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或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有拉斯佩和（Laspeyres）指数和帕史和（Paasche）指数、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值）平减指数和所有资产价格指数等。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是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劳务和农业生产资料实际平均价格（含牌价、议价和市场调节价）水平。我国以往所选用的代表性商品有331种生活消费品、20种劳务项目和52种农业生产资料。该指数虽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般物价（特别是用现金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但尚欠全面。譬如，它未能较全面地反映生产资料和必保的非商品性费用等价格，况且所选择的代表性商品构成也不尽科学。

比起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能较迅速地反映直接关系家庭消费的物价趋势。消费物价指数是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一个指标，它是根据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的消费开支所编列的物价指数。许多国家根据不同阶层的消费支出状况，编制出不同的消费物价指数，其缺陷在于所涵盖的商品价格范围较窄。目前我国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不包括社会集团消费、生产资料以及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价格。

消费物价指数一般地说是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则不同，它是根据制成品和原料的批发价格编制的指数，它在我国是指批发企业向零售商业供应的商品以及商业部门供应生产建设单位的生产资料所采用的价格指数。批发物价指数能较灵敏地反映商业循环过程中的物价变动。不过，它未包含劳务价格，也无法反映优待价格、批零合一价格、调拨价格和供应价格的变动。

比起上述的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拉斯佩和指数更能反映商品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拉斯佩和指数公式为：

$$L_P = \frac{\sum_{i=1}^n P_i^t \cdot X_i^{t-1}}{\sum_{i=1}^n P_i^{t-1} \cdot X_i^{t-1}} \cdot 100$$

在公式中， P_i^t 和 P_i^{t-1} 分别是第*i*种个别商品在*t*期（下设为报告期）和（*t*-1）期（下设为基期）的价格， X_i^{t-1} 是第*i*种个别商品在基期的供应量， $P_i^t \cdot X_i^{t-1}$ 和 $P_i^{t-1} \cdot X_i^{t-1}$ 是个别商品在报告期和基期的名义支出， $\sum_{i=1}^n P_i^t \cdot X_i^{t-1}$ 和 $\sum_{i=1}^n P_i^{t-1} \cdot X_i^{t-1}$ 分别代表报告期和基期的商品名义支出总额。并假定基期价格水平为100。

在拉斯佩和指数中，第*i*种个别商品价格比率在基期指数中的权数以 g_i 来代表，则

$$g_i = \frac{P_i^{t-1} \cdot X_i^{t-1}}{\sum_{i=1}^n P_i^{t-1} \cdot X_i^{t-1}}$$

就反映商品价格总水平而言，拉斯佩和指数所统计的商品对象较为全面。并且，它主要采用基数数据，俟报告期一结束即可进行统计。

然而，这种指数疏忽了两个时期商品供求变动这一因素。具体而言，有一部分商品在基期和报告期都上市，但每种商品供求的价格弹性不一，在价格升降时，只要商品供求有弹性，则该种商品在基期和报告期的供求量就不会固定不变。再者，从基期到报告期，产品会出现新陈代谢。有一部分产品在基期虽为市场所需，但在报告期却已成为过时的“明日黄花”；反之，有一部分产品在基期未问世，而在报告期已应市。可是，拉斯佩和指数把基期

供应量 $(\sum_{i=1}^n X_i^{t-1})$ 当作报告期商品供应量，这就容易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与之不同，

帕史和指数的公式是：

$$\frac{\sum_{i=1}^n P_i^t \cdot X_i^t}{\sum_{i=1}^n P_i^{t-1} X_i^t}$$

帕史和指数用报告期商品供应量来计算同期一般物价水平，这是合理的。但它用报告期商品供应量当作基期商品供应量，这同样忽略了在两个时期商品供求结构的变更，疏虞了两个时期都上市的商品缘于价格起落所引起的供求量的变化。不仅如此，这两个指数公式也无法全面地统计劳务和其他资产的价格。这两个指数公式既有可取之处，又有缺陷，我们可在对它们进行修改后加以利用。

第一，只要商品具有供求的价格弹性，价格升跌就会引起商品供求量的变化。倘若拉斯佩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昂贵（指报告期价格比基期价格昂贵）的商品给的权数过大，帕史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昂贵的商品给的权数就往往过小；如果拉斯佩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便宜（指报告期价格比基期价格便宜）的商品给的权数偏小，则帕史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便宜的商品给的权数又常常偏大。基于此，可用几何平均法求出这两个指数的平均值，使之趋近于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情况。

第二，严格地说，这两个指数公式只能较准确地反映在基期和报告期在市场上都有供求量的那些种类商品的价格水平（以 P_A 表示）的变动。为了较为客观地反映一般价格水平，还应考虑两项价格：一是在基期上市而在报告期已被淘汰的那些商品价格水平（以 P_B 表示），二是在基期未供给而在报告期已应市的新产品价格水平（以 P_C 表示）。这样，

$$\frac{\text{报告期一般价格水平}}{\text{基期一般价格水平}} = \frac{P_A + P_C}{P_A + P_B}。$$

第三，为了弥补拉斯佩和指数和帕史和指数未蕴含劳务价格的不足，可采用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因为这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额对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额的比率。考虑到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把中间产品价格排除在外，可用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和社会总产值平减指数的平均值来表示。

还应看到，上述的各种指数均有以下缺憾：

首先，它们无法包裹实质资产存量和其他重要资产（如金融资产）价格指数。可是，在通货的快胀期，各种资产价格上升的现象时有发生，一般人也将实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作为保

值对象。鉴此，从理论上说，应测算所有资产——金融和非金融资产、有形和无形资产、耐用和非耐用资产、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等在内的价格指数（当然这要有较为完备的资料以及统计制度和手段）。其公式拟为：

$$\frac{\text{报告期物价水平}}{\text{基期物价水平}} = \frac{\sum_{i=1}^n P_t X_t}{\sum_{i=1}^n P_{t-1} X_{t-1}}$$

在公式中， X_t 和 X_{t-1} 分别是报告期和基期的资产向量， P_t 和 P_{t-1} 分别是报告期和基期各资产的价格向量。

其次，各指数尚难准确地反映通货膨胀率。一方面，前已述及，有些物价水平上升并非由于通货膨胀所使然，因而在各种物价指数中应扣除非通货膨胀因素。另一方面，广义的隐蔽性通货膨胀会表现为商品短缺、强制的（即非意愿的）货币购买力结余，以及在实行物价管制下物价在表面上暂为平稳（但时常伴有黑市价格居高不下）。要全面地反映通货膨胀，不但要看公开性通货膨胀（物价全面持续地上升），而且要匡计隐蔽性通货膨胀。可用多种方法测算隐蔽性通货膨胀。其中鉴于目前我国用于测算商品短缺程度的统计手段尚未完善，可暂用货币结余购买力（这里包括银行和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以及居民手持现金），减去其中意愿储存额之差来表示。其意愿储存额等于结余购买力与意愿储存系数（意愿储蓄存款系数和意愿持币系数或马歇尔系数）的乘积。意愿储存系数是意愿储存额占结余购买力的比率（这可通过抽样、典型和重点调查后得出）。

· 书讯 ·

《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一书正式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赵友良教授所著《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一书最近已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分六编十五章。

第一编为导论；第二编论述会计的产生与会计要素的形成时期——从奴隶制时代到春秋战国；第三编论述会计审计初步发展时期——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第四编论述会计审计逐步完善时期——从隋唐到五代十国；第五编论述会计审计进一步发展时期——从宋到清末；第六编论述中国古代会计审计思想。全书特色是以史带论，学术观点鲜明。

本书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研究会计审计史的方法，然后据以分析和探索历代会计审计的具体实践，并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密切联系，从而考察和判断会计审计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书中还评述了历史上著名学者和理财家对会计审计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言论。

这是一部较为全面地概述我国古代会计审计发展史的专著。著名会计学家姜尔行教授特为本书作了序。

（朱）